

鸠山内阁东亚共同体构想及其实现的可能性 ——从集团缔结原则的视角

张 建立*

摘 要：基于“自立与共生”理念的鸠山内阁东亚共同体构想，既带有东亚价值观的特点，又吸收了现代国际秩序的主权平等原则，因而获得了中国、韩国的积极呼应。由于东亚情况的复杂性，加之鸠山个人政治命运的盛衰以及民主党政权的不安定等因素的影响，“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的实现进程也可能被延缓，但因其顺应了东亚地区的融合与一体化的历史大势，实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关键词：东亚共同体 自立与共生 集团缔结原则

2009年9月上台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将构建“东亚共同体”作为日本新政府一项重要的外交理念。鸠山内阁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到底是民主党政权用来抗衡前政权“过度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表演呢？还是民主党政权勾勒的一幅对外交政策进行实质性改变——从“亲美入亚”到“脱美入亚”的蓝图呢？鸠山内阁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呢？对此，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的专家们进行了很多精致的解读，但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进行分析的文章却不多见。本文主要采用心理文化学的方法，从集团缔结原则的视角，从学理与历史实践经验两个层面，来对鸠山内阁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及其实现的可能性进行粗略分析。

一 鸠山内阁东亚共同体构想创新点

众所周知，在东亚历史上，曾经影响最为深远的国际关系体系，就是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的朝贡体系。这是一个自秦、汉统一直至清王朝灭亡两千多年来实际存在的东亚国际秩序，是一个以中国中原地区政权为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在这个体制中，中国中原政权处于中心地位，包括日本在内的各朝贡国承认这种地位，并依据与中央政权关系的远近，定期或不定期地以某种形式向其表达敬意，但在大部分时间内，日本处在该体制的边缘。正是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历史背景，所以《产经新闻》等对2009年12月10日民主党干事长小泽一郎率领包含140名国会议员在内的600人庞大访问团访华一事讥笑说：“仿佛是邻国的家臣们去参拜中国的皇帝一样，弥漫着朝贡的气息”。

朝贡体系内的国际秩序，是基于中国人的集团缔结原则来维持的。也就是说，朝贡体系不是基于阶级、信仰、种族、力量强弱等非自然因素，而是基于亲疏、内外、远近等主要来自家庭成员的差别来定位体系内的各个国家的。19世纪朝贡体系崩溃之后，在东亚地区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国际秩序。日本一直试图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诸如二战时期的“大东亚共荣圈”、自民党政权时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以及现政权的“东亚

* 张建立，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文化研究室副研究员，研究专业为日本文化，研究方向为日本国民性。

尚会鹏：“‘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

共同体”构想，可以说这些都是自朝贡体系崩溃之后探索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大东亚共荣圈”，是一种殖民体系下的东亚国际秩序构想。虽然很多昭和初期的日本知识分子，如“亚洲主义”的论客们，以及西田哲学系统的历史学者、政治学家等都纷纷被动员起来，甚至他们有的是自己主动参与了“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建构工作，但是，那种仿效西方殖民主义价值观、意欲以武力一统东亚、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的“大东亚共荣圈”，令东亚人深恶痛绝，并早已遭到了东亚人的唾弃。

自民党政权的“东亚共同体”构想，虽然不再诉诸于武力一统东亚，但是，它依然是一种力求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基础、以日本为主导来构筑东亚国际秩序的构想。2001年1月，小泉首相先后对东盟5个国家进行了访问，并在新加坡发表的演说中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这是日本政府战后首次正式提出“东亚共同体”概念。随后，日本各主要媒体也一度以高频率评论这个话题，但日本的政府倡导和民间议论，都还缺乏对东亚共同体构建战略的更为缜密的思考，直至2005年8月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提出题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的鸿篇政策报告书，才为自民党政权构建东亚共同体勾勒了一幅较为具体的战略蓝图。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是2004年5月18日由研究机构牵头、政府部门做后盾成立的战略研究机构，是迄今为止日本出现的阵容最为强大的“产、官、学”一体化的战略研究体制，是一个日本史无前例的脑库网络。强调日本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差异，欲以西方价值观来主导东亚合作，是“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报告书的最大特色之一。2005年12月14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的举世瞩目的首届东亚峰会上，日本首相小泉发表演说时强调，东亚共同体要建立在共同拥有民主主义和自由以及人权等普遍价值观的基础上。这一发言，基本上是遵照“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报告书的主旨进行的。但是，自民党政权这种基于西方价值观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不仅在当时签署的《关于东亚峰会的吉隆坡宣言》中没有得到多大反映，而且最终因缺乏中国等东亚主要国家的呼应，无果而终。

与之相对，鸠山内阁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可以说一经提出，即得到了中国和韩国的积极呼应。2009年10月10日，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后发表的《中日韩合作十周年联合声明》称：“三国致力于在开放、透明、包容原则基础上建设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致力于区域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的沟通与协调日益加强。”这是“东亚共同体”概念首次被明确写入三国共通的政治文件中。那么，为何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会得到中国、韩国如此及时热烈的呼应呢？我们认为，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提出了一种中国与韩国都能够接受的、新的集团缔结原则——“自立与共生”。

2009年11月15日，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新加坡国际关系研究生院发表了题为“走向亚洲的新相互关系——实现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亚洲政策演说，在该演说中，他详细阐明了日本与亚洲的关系和日本新政府决意推进的东亚共同体构想。鸠山说：“日本新政府宣言重视亚洲外交，其支柱是东亚共同体构想。如果追溯我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思想源流，那就是我特别强调的‘友爱’思想。‘友爱’也可以翻译为‘博爱’（fraternity），就是在尊重自己的自由和人格的同时，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和他人的人格尊严。这也可以说是‘自立与共生’的思想。”

其实，关于“自立与共生”的思想，早在1996年鸠山由纪夫创立的旧民主党《立党宣

〔日〕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 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第51-54页。

言》中就已经有过详细的阐述，鸠山由纪夫在《Voice》（2009年9月号）发表“我的政治哲学”时，再次进行了转引。鸠山说：“我们认为，今后置于社会之根底的应该是‘友爱’的精神。讲求自由，则易导致过度放纵弱肉强食；讲求平等，则容易堕落为枪打出头鸟式的恶性平等。友爱虽然能够克服这二者的过度偏颇，但是，至今100年间却被严重轻视忽略了。……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无限多样的个性，每个人都是无可代替的存在，正因如此，我们都拥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并且同时也对自行选择的结果负有义务。我们在重视这种‘个体的自立’之原理的同时，还应该重视‘与他者共生’的原理，即要在尊重彼此的自立性与异质性的前提下，求同存异，通力合作。这种自立与共生的原理，不仅仅限于日本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必须同样贯彻于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鸠山由纪夫的政治哲学的形成历程、内容可知，“自立与共生”的思想不仅仅是其构想的东亚共同体的缔结原则，也是鸠山对日本社会内部集团缔结原则以及世界新秩序的一种构想，可谓是一种政治哲学理念的创新。“自由”、“平等”观念是一种权利观念，是基于“个人”这种西方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的一种价值观。因为“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以竞争、利益为出发点的，所以，如果基于这种价值观去处理国家间的关系的话，那么就会如鸠山上文所述容易“导致过度放纵弱肉强食”和“堕落为枪打出头鸟式的恶性平等”，也就是说，在此基础上推导出的国际秩序模式，本质上也必然是无道德的或者是弱道德的。但是，鸠山倡导的“友爱”即“自立与共生”的思想，则是一种道德观念，它强调要在尊重彼此的自立性与异质性的前提下，求同存异，通力合作，因而由此推导出来的国际秩序模式，是极具包容性且强调道德的，所以本质上也必然是一种内敛的、温和的秩序。不基于阶级、意识形态、种族、力量强弱等非自然因素来建构国际秩序，在这一点上，“自立与共生”的思想与古代东亚国际秩序的内在原则是接近的，带有东亚价值观的特色。但二者在各自的缔结原则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朝贡体系是基于亲疏、内外、远近等主要来自家庭成员的伦理差别来定位体系内的各个国家的；而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是根据‘开放的区域合作’的原则，通过推进相关国家间的各领域的合作，在这一地区建立多重的机能性的共同体之网。……关于合作的方式，可以考虑在所有领域具有合作意向与合作能力的国家先行参加，在其合作获得成效的基础上再增加合作伙伴”，东亚共同体的构成者全是“拥有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的人们”（鸠山的亚洲政策演说“走向亚洲的新相互关系——实现东亚共同体构想”）。依据“共同理想和共同目标”来缔结集团——东亚共同体，“具有合作意向与合作能力的国家先行参加”，从这些表述来看，在鸠山构想的东亚共同体的缔结原则中，又有着很浓厚的西方“个人”社会缔结集团所遵循的契约原则的味道。既带有东亚价值观的特点，又吸收了现代国际秩序的主权平等原则，这或许是鸠山“亚洲共同体”构想为何迅速获得中国、韩国的积极呼应的最主要原因。

二 鸠山内阁构想“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的社会动力

那么，鸠山为何要构想“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其社会动力何在呢？一般认为，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追求一体化的动力，主要是为了谋求经济利益。例如，对区域合作的成功典范——欧盟的创设动力，大多如是观。“欧洲一体化的根本原因是过去半个世纪欧洲大陆面临的一系列共同的经济挑战带来的。当单边和双边政策失败后，民族国家领导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只好寻求多边方式应对这些经济挑战”，“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是一系列理性选择的产物，特别是经济利益、相对权力、可靠承诺三个因素在国内利益集团之间和欧盟层面的

成员国之间博弈的结果”。对构建东亚共同体的社会动力，学者们大多也侧重从经济利益方面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对于鸠山构想“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的社会动力，大体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分析。

（一）从学理层面来看，心理文化学认为，“安全、社会交往和地位”是每个文化的人都必不可少的社会需求

个人是这样，作为国际行为体的国家也是这样。诸如客观上狭小的日本，却非得要自称大日本之类的言动，即属于一种追求地位需求的表现。安全、社交、地位三种社会需求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极少有为了单一需求而行动的，往往一种需求伴随着其他需求。人的每一种社会需求依次又分为生物性、社会性、感情性需求这样三个层面。那么，人的这种社会需求又是如何获得满足的呢？心理文化学认为，人的各种社会需求是在集团中得到满足的。人不是孤立的，是要缔结为各种社会关系的，即构成集团。社会的最小单位不是个人而是群体（即集团），人的各种社会需求也是只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才能得到满足。集团又分为初始集团和次级集团，不同的文化模式，缔结集团的原则不同，满足人的需求的方式亦不同。东亚共同体可谓是一个跨国界、超越民族、血缘的大的次级集团，它是东亚人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各自的需求的必然产物。因此，构建东亚共同体，创设一种稳定的新的东亚秩序，不仅是鸠山新政府的愿望，亦是中国、韩国等东亚国家共同的愿望。

（二）从实践层面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强，促动了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政治发展中，超国家经济联合体的发展已经形成风潮。其中，欧盟虽然也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可以说是目前所有区域合作组织中，相对而言最为成功的。欧盟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制度，颁布和实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公共政策，并在一些政策领域对欧洲社会的价值分配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是，在东亚地区，尽管以中日韩国家个体为单位的发展成绩在过去的半个世纪耀人眼目，但是区域合作与区域国际政策协调一直不够顺畅。鸠山在其亚洲政策演说中称：“正是思考了欧洲和解与合作的经验，才形成了我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原型。”麦考马克在其著作《虚幻的乐园》中说：“日本后来在‘共荣圈’上失败了，其原因是日本没有提供一个能给邻国的国民带有归属感，或者乐于参加的共同体的图像。”其实，并非日本不想给邻国的国民一种归属感，原因是诸如“大东亚共荣圈”那种殖民体系下的共同体愿景，是不可能获得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认同的。自民党依据西方价值观构想的东亚共同体，也不可能得到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支持和呼应，因而也难行得通。正因为这些前车之鉴，再加上鸠山本人对欧盟的认识，才最终催生了意在矫正片面追求西方价值观的、“自立与共生”原则下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三）鸠山由纪夫倡导“自立与共生”的政治理念，体现在国内政策上就是积极推动实现具有日本永住资格的外国人参政；体现在外交政策上就是构建东亚共同体

“自立与共生”，可谓是鸠山的政治夙愿，早在1996年鸠山创立民主党时，他就祈望“自立与共生的原理，不仅仅限于日本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且必须同样贯彻于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的联系”（民主党《立党宣言》）。因此，对基于“自立与共生”理念构建的东亚共同体，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现政权用来抗衡前政权“过度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表演，而是理解为现政权勾勒的一幅对外交政策进行实质性改变——从“亲美入亚”到

〔美〕安德鲁·莫劳夫奇克：《欧洲的选择——社会目标和政府权力：从墨西哥到马斯特里赫特》，上册，第4—5页。转引自朱立群：“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问题、路径与特点”，载《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总第110期）。

〔澳〕加文·麦考马克著、郭南燕译：《虚幻的乐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83页。

“脱美入亚”的蓝图较为妥当些，而这亦正是鸠山构想“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的最大的社会动力。

三 鸠山内阁东亚共同体构想实现的可能性

那么，鸠山内阁东亚共同体构想实现的可能性又如何呢？

（一）从理论层面来看，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实现方式，符合满足人的需求的顺序，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

鸠山在其“走向亚洲的新相互关系——实现东亚共同体构想”的亚洲政策演说中说：“我特别重视在贸易、投资、金融、教育等广泛的领域具体地推进合作。在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要共同制定规则，相互配合，集中大家的智慧，共同地遵守规则。这样，我们就不仅能够得到现实的利益，而且还能够培养相互信赖的感情。……关于合作的方式，可以考虑在所有领域具有合作意向与合作能力的国家先行参加，在其合作获得成效的基础上再增加合作伙伴。……最后，我想说一下‘推进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最要紧的关键事项’，这就是‘人’。现在，日本制品已经普及到亚洲各国，日本从亚洲各国的进口也在增加，但仅仅如此还不能够实现相互理解。只有通过‘人与人的接触交流’，我们才能够做到真正地相互理解。”由此可见，鸠山实现其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方式是比较理性的，先从贸易、投资、金融、教育等领域做起，先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按照满足人的生物性需求、社会性需求、情感需求的顺序，依次推进、扩大合作的内容，这是切实可行的。

（二）从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短期内能否实现还存在一些不安因素

鸠山在其亚洲政策演说中虽然没有明确东亚共同体的成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是试图排除美国的，这必然会引起美国的警惕。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在全球其他地区采取战略收缩姿态，但在亚太地区却异常活跃。正如很多专家们也指出的那样，美国的因素，将会对东亚共同体的构建起到重大影响。另外，日本国内外赞同鸠山政治哲学者的多寡也会产生影响。

四 结 语

总之，基于东亚情况的复杂性，加之鸠山个人政治命运的盛衰以及民主党政权的波动，“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的实现进程也可能被延缓，但是，东亚地区的融合与一体化的进程，乃历史大势所趋。从理论上讲，遵循“自立与共生”原则的东亚共同体实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而且，这种模式将有可能成为比较理想的新的东亚国际秩序。鸠山不仅对东亚共同体的制度架构之类的形式问题避而不谈，也并没有像自民党那样坚持必须由日本来主导东亚，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因为新的东亚国际秩序终将由谁来主导，空费唇舌地讨论没有多大意义，它不可能是某一国某一个精英政治家一厢情愿就能决定得了的事情。但是，无论将来哪国会起实质性的主导作用，大概类似朝贡体系下的那种国际关系，是不可能再次出现的，共同体内的国家也将可能在极大程度上实现独立自主、和谐相处。自朝贡体系崩溃以来，虽然日本一直想主导东亚，但从历史上看，可以说，无论在任何时候，日本都没有能够成为东亚秩序的核心，直至今日，它依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另外，从日本国民性的特点来说，如果中国能够更加富强，文化更加有魅力，日本真正复归亚洲体系的进程会加快，遵循“自立与共生”原则的东亚共同体实现的可能性也会更大。

最后,笔者还想再次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在日本,虽然有一些以著作的形式表达自己政治信念的政治家,如中曾根康弘、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但像鸠山由纪夫这样拥有非常体系化的政治哲学,并能够予以明确阐述的政治家并不多见。早在1996年鸠山由纪夫就已经对“自立与共生”的思想有过详细的阐述,因此,他倡导构建基于“自立与共生”思想的东亚共同体,并非其一时心血来潮。鸠山由纪夫统帅的民主党,虽然表面上看似并非是其政治理念获得了国民的认同而登上的政权宝座,但“自立与共生”理念,对选民心理的影响仍然是不容小视的。战后,在日本,自由、平等之类的西方价值观得到广泛深入的普及,特别是2001年成立的小泉内阁积极推进基于美国新自由主义、市场原理主义的结构改革,虽然这种改革使日本经济获得了短期性的成长,但同时也打造了一个基于西方价值观的“残酷至极的竞争社会”,结果引发了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曾号称“一亿总中流”的日本社会中产阶级的崩溃,个人主义蔓延,家庭崩溃,自杀者连续多年居高不下。因此,人们开始怀念传统日本社会的价值观,有识之士也纷纷撰文著书或利用各类媒体发表对西方价值观的反省之言,正是在这样一种国民社会意识出现波动的大背景下,鸠山由纪夫早在1996年旧民主党《立党宣言》中就已经有过详细阐述的“自立与共生”思想,才获得了迟到的评价。这种日本国民意识的现状,对于促动“自立与共生”的东亚共同体的实现,也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第二,日本国内外的很多媒体、学者都称鸠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内容不明朗,一部分民主党议员也说,只能等到2010年参议院选举后才能为东亚共同体进一步充实内容。其实,在鸠山的亚洲政策演说中,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和政策已经相当明确了。那么,究竟还有什么内容非得要等到参议院选举过半数、稳固民主党政权后,才能进一步充实呢?笔者推测,大概惟有关于日本国家未来走向的内容,才会需要“多数民意”这么重要的条件吧。日本近代以来一直是在延续着与强国结盟的外交政策,如果民主党政权参议院选举也能像众议院选举那样,获得半数以上议席,稳固了政权,那么鸠山由纪夫所主张的“自立与共生”思想,就非常有可能得到进一步的落实,若能如此,那么日本走出结盟的老路,或许也就为时不远了。恰值日美安保条约缔结生效50周年的2010年,或许会成为日本尝试对近代以来的外交政策进行实质性改变的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年份。

参考文献

尚会鹏:“‘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

朱立群:“欧洲一体化理论:研究问题、路径与特点”,《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4期。

(日)三浦展著、陆求实、戴铮译:《下流社会》,文汇出版社,2007。

(日)子安宣邦著、赵京华编译:《东亚论 日本现代思想批判》,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本文收录于李薇主编《日本蓝皮书 日本发展报告 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

(日)三浦展著、陆求实、戴铮译:《下流社会》,文汇出版社,2007,第45页。